

11.04



第 52 期

海寧文史資料

政协海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创建硖石给水站始末

孔庆云

三十年以前，“老硖石”们都还记得，河网交叉密布的江南古镇硖石还没有自来水，居民一直饮用河水和 180 多口土井水。干旱季节，河水断流，井水干涸，只能从几里外塘河中担水饮用。平时，污水、废水排入市河，污染水体；络麻收获季节，洗麻水使河水变黑发臭；恶劣的水质，严重影响人民生命和健康。镇周围曾经流行血吸虫病，肠道病和寄生虫发病率也较高。硖石人生活饮用水，成为一大难题。

五十年代，中共硖石镇委和镇人委，就想设法改善本镇的供水条件，筹划自来水厂，但因财力、人力问题，未能如愿。

1960 年 7 月，原中丝三厂党委书记孙景兰同志，在一次会议上提出“中丝三厂的水池、水塔等供水设备，尚有潜力，只要能铺设部分水管，增添一些设备，可以解决全镇部分群众的生活用水，改善人民群众饮用水条件”。根据这一建议，我和有关同志一起作了初步调查，认为他的倡议是可行的，并向县人民委员会写了书面报告。

经过中共海宁县委和人民委员会一年多的专题研究和资金筹划，1962 年 12 月，县人民政府决定拨二万八千元办硖石自来水给水站；镇党委研究决定由我专门负责此事。

1962 年 12 月 26 日，我与沈连清同志一起抵沪，购买紧俏物资——水管、进水设备及出水泵，住在上海浙江旅馆。当时海宁来的采购员大抵住在这里，他们看到我，纷纷前来问好，并问道：“孔镇长到沪有何贵干？”我回答：“硖石要办自来水，你们听了很高兴吧。今天我

来是请你们帮忙的。”话音一落，房间里很快热闹起来，人心振奋。都说这是硃石镇的福音，我们人人都是受益者。孔镇长，你需要我们干什么？尽管布置，我们保证完成。这时房内已坐满了人，一个没有通知的小会，就在这个小房间里开始了。有的表示购买水管，有的表示购买水泵、三通、缩节……讨论非常热烈，表示一月底保证交货。

会议结束时，时间已是下午六点，大家连忙去饭店吃饭。因为天冷饭凉，吃了不舒服，夜间睡的又是加铺，到深夜十二点，我的胆囊炎又犯了，疼痛难忍，沈连清同志把我送去上海红十字医院挂急诊，打了止痛针。第二天，上海此行事情布置妥当，带病返回了硃石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，在各方面积极配合下，各种水管（6寸—1.5寸）已购进44.268吨，水泵电动机各二套，及其他一些零部件，物资基本配齐，初步的施工方案也已修改完毕，我们的方案是由小到大，由土到洋，第一步先完成河西片供水安装工作，即从中丝三厂出水，经方便街进方便弄，经西南河后街到太平桥，再分二路，一路进南长埭到小瑶桥，一路向北经周家廊下到沙泗浜并继续向北到邮电局门前分开，一路向干河街直到茅桥，一路进羊坝桥到新马路向北过建设桥，分开西到西寺桥，东到新埭，全长2500米。先安装公用龙头20个（单位自装的不算在内，凡经过之处单位要求安装的，都给予满足，经过初步研究，计划分两期工程解决河东片吃水问题，二月份开工，三月底完工，越快越好。人员和技术力量由中丝三厂、机床厂、胶木厂、五金厂、民办服务社、建筑社、房管会、食品厂和豆制品厂等单位抽调，得到了各方一致拥护和支持。

1963年2月5日，供水站工程正式开工，我们党的干部带领工人阶级发扬了无私无畏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，不怕脏，不怕累，步调一

致，齐心协力，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，自来水的安装工程顺利竣工。1963年3月31日，第一次送水，那天没有搞什么剪彩仪式，我和办公室的同志及几名安装工，从中丝三厂沿着水管线路，走到一个龙头前面，打开龙头，水急流而出，当群众看到这白哗哗的自来水，个个眉开眼笑，拍手雀跃，腿快的赶快回家拿来水桶，脸盆来接水，我们每走到一个龙头前都会围来许多人。一位老太太笑着说：“我活了七十多岁第一次看到这小小的管子内会自动流出水来，真方便。要是能接到我家就更好了。”这时一位小青年拎着一桶水走过来笑着说：“这水好清啊！”站在旁边的一位工人回答说：“这水是用沙滤过的，烧开水是没有水脚（沉淀物），不信你可以回去试试看。”他的话又引起一阵开怀大笑。

走到西寺桥头，围观的群众更多，有的人当场提出，为啥管子不接到硖西，我们硖西吃水更困难啊！我向他们作了解释，说明目前资金有限，第一期工程只能装到此处，以后还要扩建的，现在你们可以先到这里取水，等待今后扩建，硖西也会有的。”他们说：“有盼头就好，请政府不要忘记我们。”

公用龙头由居委会指定专人管理，每户按用水人数收费，成人每人每月一角，小孩每人每月五分，自来水供应情况良好，4—6月实现供水量约15000吨，有6000多人能吃到自来水，受益群众非常满意。但全镇尚有1万多人未能吃上自来水，纷纷要求扩大供水面，而中丝三厂的供水量已达饱和状态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
我们为此事寝食不安，昼思夜想，总算理出一个眉目。要解决问题，还是要靠党的领导。于是迈步走向县委书记徐志远的办公室向他作了汇报，徐书记说：“海钢一厂已停产，该厂厂址有25吨的水塔，还

有不少房子，可以改建供水站。”改建工作得到了县委、县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，也得到了在镇各有关单位的通力协作，扩建给水管在1963年9月五届四次市建绿化工作委员会上研究通过，批准资金46000元，需建储水池200M³，三套过滤箱（六只），维修水塔，改修机房，并安装消防龙头。工程承包给海宁修建处。物资、交通部门对这一工程作了优先安排、计划63年10月25日动工，二十五天完成施工。

1964年1月10日，给水管在新站址正式投入生产实行统一供水、日供水量为1500立方米，新增8寸、6寸、4寸以上管道1264公尺。至此，除横头街外，全镇大部分居民和部分单位，均能饮用自来水。

1964年3月22日经中共硖石镇委批准，给水管与硖石房管所、西山公园成立联合党支部，其业务归海宁县工业交通局直接领导。1966年12月15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改名为硖石自来水厂。

一九三四年硖石大旱闻见追忆

顾明江

两头板，已有六十年了。

民国廿三年（1934）正月元宵前后，一天也没有落过雨，乾脚燥手，真够高兴，大家很感谢天公。可是乐极生悲，以后一直无雨，天天都是太阳临空，万里无云，直到阴历五月份（以下均指阴历）黄梅季节还未下雨，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”常年旧规，这年变成了句空话。断屠（注）已经断过，求神拜佛也已经求过（河底向天以后，还有向河底拜

揖祈祷的)。旱象已成，农村里扶老携幼纷纷四出逃荒了，也有鬻女为婢的。逃荒大致分两路：一路经嘉善到松江等处；一路过嘉兴到吴江。这年我县及邻县嘉兴、海盐等县遭受旱灾，而吴江等地水源充沛，丰收有望。我长大成人以后曾到吴江县境工作，他们那里有的人爱开玩笑，有次笑吟吟地对我说：“顾先生。廿三年份俾（你们）海宁人到偕堆（我们）格塌（这里）来讨过饭。”说过后笑容未已还笑我硖石民风欠谨敕云。

四、五月份之交，市河开始发臭发黑，于是雇船从郊区驳运清水，再挑担而入。不久，市梢头也干涸了，从塘桥西岸到塘桥东岸可在河底步行而过，万禄浜、小瑶桥等处都是一样。不知柴米贵的街上小孩，却感觉别致方便。六月份长山桥黄道湖（俗称黄荡湖）湖底向天，有人在那里搭棚开茶店，不少人前去吃风凉茶。

日常吃水和用水成问题了。原来南关厢住户叫挑水大老挑一担水，只需三个铜板，这时要二十个铜板了，是从塘桥外一里多路一个名叫“斜筴口”的地方挑来的。这个“斜筴口”的河底有个深潭，宛似一口井，挑得多了，潭水也要发浑，需要加明矾澄清后才能食用，最好一清早去汲水、潭水隔一夜便澄清了。

这时米价逐渐上涨，硖石所喜食的冬双米从8元多，上升到最高市价18元（零售价还不止）。按冬双米起源于苏州农村。《清嘉录》有记载，谓苏州农民在冬季农暇舂米储囤，和之以糠，囤顶上盖砵糠，等来岁取食。后米商仿效，为求周转快，特地蒸白米约1石为囤心，再和以红糖（做过冬双米的糠）为时20余天就可开囤出售了，原名为冬舂，后商人简化为冬双。储囤日脚长远之冬双与嘉善西塘精白粳、宁尖，昔时同为浙西人享用之优质米。

其时苏嘉铁路还在建筑之中，故吴江等县粮食来源，水陆均受梗阻。

五月份开始施粥和卖平果米了。一个街上人用2角小洋买包叉肉作为过施粥的小菜，被检举，罚米一石，以充善举。

米业公会由顾旭丹主持，发起在米业公所筹米平果，每人限购2斗，第一天平安无事。第二天信息普遍传开，人山人海争先恐后的抢着购米，有个乡下老阿太因体力不济轧倒在地，被众人践踏而死，于是平果停止了。

米市协兴顺米行在旱荒期内贷米200石于丁桥米行，再由丁桥米行放帐于农民。后协兴顺米行放帐全部未收回。

时入七月份还不见雨。海宁已有200余天连续不下雨了。

七月份有天我到家门口，听见街上人在喊：“平湖开麒麟坝哩！”我急忙跑到河岸上一站，看见对面新开河里浊水汹涌奔腾而来，向市河南北两方分流。第二天早旱起来看见河水已漫岸一半。第三天清早看见河水已恢复原状，河干于是结束。

逃荒出去的人，有的不回来了，据吴江县的人说有的已在彼处结婚安家。

河干对镇上各行各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，首先是航运业，其次是搬运、茶店、饭店、点心店等，米厂、丝厂、槽坊、酱园等也受一定影响，而粮食业有的如塘桥头裕和坊获利甚丰。

河干期间迷信说法四传，谓迎灯是“陆地开花”，主有旱灾云云。

(注)：断屠：不杀猪等活畜，以求雨。

略述从清末到解放期间在 海宁流通的货币及代用币

沈云汉

十八世纪中叶以前，市场上的货币是白银与铜钱并用的。后来，大量外国银元流入中国，而且成色和分量比较固定，又携带方便，收付简易，所以市场上逐步改为以银元定价。由此产生了银两与银元、银两与铜钱、银元与铜钱三种比价。

到光绪十四年(1888)，清政府开始铸造银元后，白银在市场上不再流通了。

这里略述清末开始流通于海宁市场的各种货币，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当年我国金融从比较稳定、逐步走向纷乱，因而造成人民的苦难与贫困。

(一)银元。因为最早是从外国流入的，所以俗称“洋钱”或“洋钲”。

1. 本洋。本洋是西班牙银元，早在明朝万历年间，就由对外贸易中流入中国，它的重量是七钱二分。本洋在海宁为数不多，1927年北伐以后已很少看到，但仍流通。

2. 鹰洋。墨西哥银元，一面有鹰的图案，故俗称鹰洋。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开始铸造，鸦片战争后大量流入中国。1905年墨西哥采取金本位而停铸，但流入我国的鹰洋一直在市场上流通。

3. 龙洋。光绪14年(1888)清政府在广东开铸，一面是龙的图案，一面是“光绪元宝”四个字和下面“广东省造”。每枚库平七钱二分，含银九成。此后各省纷纷仿造，而且含银成色减少，甚至出现夹铜、夹铅

等劣质银元。这种劣质银元，四川省版的最多，俗称“假洋钲”。

（注：“库平”是清康熙年间制订的白银计量单位。库平一两等于37.301克。）

4. 民国开国纪念银元。1912年（民国元年）民国成立时发行，一面是孙中山头像；一面有“开国纪念”和“壹圆”字。

5. 袁世凯银元。袁世凯窃国后，于1914年铸造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。因袁的头像比孙中山的头像要大，所以四十年代后期市场上重新出现银元时，称“大头”、“小头”。

6. 船洋。1933年发行，一面是孙中山半身像；另一面是一艘中国式、三道帆的帆船。

以上六种银元是当年海宁市场通用的，至于外省版的银元，因“假洋钲”太多，一般多拒用。有些农民“吃进”了“假洋钲”，实在苦不堪言。

（二）钞票（纸币）。

我国近代史上最初由政府发行钞票是从清咸丰三年（1853）的“大清宝钞”开始的。它是以“制钱”为单位，分250文、500文、1000文、1500文和2000文五种。

1. 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的钞票。

中国银行是辛亥革命后在大清银行（清政府的国家银行）基础上改组而成的。1912年到1917年间，它是特准发行钞票、铸造银元和代理国库的。

交通银行是1907年由清政府邮传部以“官商合办”形式设立的，也发行钞票。民国以后，袁世凯把持交通银行，为其称帝筹集资金，后来就成了国家银行。

中国、交通两行发行的钞票分一元、五元、十元三种以及一角、二角面额的辅币两种。

按当时的规定，钞票是可以兑换现银（银元）的，即一元钞票兑一枚银元，而且它携带方便，所以商家是能接受，但农民还是相信银元的。

2. 中央银行与中国农民银行钞票。

中央银行成立于1928年，当时国民党已实现“统一”，建都南京，它是“御用”银行，完全控制在政府手里。

中国农民银行是为筹集“剿共”经费的“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”改建的，成立于1933年。

这两家银行成立后即大量发行钞票，说是全国通用。钞票面额也是一元、五元、十元和一角、二角。

3. 其他银行的钞票。

除了上述四家纯官办银行外，另有商办、官商合办的银行也发行钞票，它们是：

1897年在上海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；

1915年开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盐业银行；

1917年开办的金城银行；

1919年开办的大陆银行；

1921年开办的中南银行；

加上辛亥革命前开办的浙江兴业银行、浙江实业银行。除中国通商银行外，其余七家是中国民族资本的“骄子”。这七家民营银行有一定程度的联合，其中：盐业、金城、中南、大陆，称为“北四行”；浙江兴业、浙江实业、上海商业储蓄，称为“南三行”。

另外还有四明银行、中国实业银行、中国国货银行三家与中国通商银行均有官股，这四家官商合办的银行，称为“小四行”。

以上所述“北四行”、“南三行”和“小四行”均有钞票发行权。加上中央、中国、交通、中国农民四行，共 15 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在 1936 年以前都在海宁市场通用的。

但由于金融市场不稳和某些财政巨头、官僚的“兴风作浪”，不时有某某银行“靠不住”，钞票不能兑现等“风浪”发生。老百姓犹恐所持钞票贬值、甚至成为废纸，所以一直相信银元，拒用钞票时有发生。事实上一有“风浪”，钞票兑现要“贴水”是经常有的，吃亏的又是老百姓。

4. 国民政府实施“法币政策”。

1935 年 11 月 3 日，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：“币制改革”令，即“法币政策”。主要内容是以中央、中国、交通、中国农民四银行发行的钞票为“法币”；禁止白银（包括银元）流通，白银收归“国有”，作为外汇储备金；汇价为法币一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，并由四行“无限制买卖外汇”。“法币”本身没有含金量，其价值由外汇率来表示。

1936 年 5 月，国民政府又与美国签订“白银协定”。“法币政策”等于把中国的货币，让英美帝国主义控制了。大量白银外流，开始通货膨胀，造成物价飞涨，老百姓又吃亏了。

实施“法币政策”后，结束了其他银行的钞票发行权；也结束了白银在市场流通的历史。

5. 汪伪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（简称：储备票）和日本侵略军的军用手票（简称：老头票”）。

1937 年“七七”事变和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失败，日本侵略军迅速

占领了南京、杭州和上海(除租界)三角地带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。首先进入海宁市场的是日本“军用手票”(也叫“军用票”“老头票”,它是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、即大量发行,强迫老百姓使用。另外还有少量日币是日本军人、商人带入的也强行通用。

1938年4月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成立,5月设立“华兴银行”,发行“华兴券”也进入市场。

当时,流通领域还是国民党的法币为主,日币、军用票、兴华券与法币是等价的。

军用票是侵略者掠夺财富的工具,据资料载,它在华中地区共发行三到五亿元,按规定它与日币是等价的,但不能兑换日币。

1940年4月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成立,到1941年1月成立中央储备银行,发行一元、五元、十元钞票和五角、二角、一角、五分、一分辅币,称为“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”(简称“中储券”)。称国民政府的钞票为“旧法币”;中储券为“新法币”。

此时,市场上所有钞票是等价的。是年2月,汪伪政府公布“收兑旧法币暂行办法”规定:只限中央、中国、交通三行的钞票,不包括50元和100元票。但广大农村和敌占区部分商家只相信旧法币,拒用中储券的事经常发生。于是汪伪政府于1941年5月颁布“妨害新法币治罪条例”规定:拒绝使用新法币者,处三到十年徒刑。

1942年3月,汪伪政府又废除了新旧法币等价的规定,其比率是旧法币100元兑中储券77元,老百姓手中的大量旧法币、无形中贬值了。到5月,又规定100元旧法币只兑50元中储券。5月27日又在敌占区禁止旧法币流通。在这高压手段下,旧法币贬值,老百姓叫苦连天。汪伪政府又发行100元中储券,通货膨胀,刺激了物价飞涨。

1943年3月,为掩盖罪恶,日军宣传停止发行新军票,但不采取收回措施,仍以18元军票作100元中储券使用。

1944年6月,日伪败局已定,汪伪又发行500元中储券;45年2月,发行1000券;6月,发行5000券;7月发行1万元券。

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,国民政府以法币一元对200元中储券的比价收兑。

6. 关金券与金圆券。

抗战胜利后,美国货大量倾销中国,既耗用巨额外汇,又冲击了国货市场;同时由于内战又起,军费无限制扩大,国民政府用增发钞票弥补亏空,造成通货膨胀,物价一日数涨,民不聊生。

关金券是国民政府于1931年开始发行的,它的全称是“海关金单位兑换券”,原是缴纳关税用的特种货币。1942年4月开始,关金券以1元等于20元法币的比率流通于除敌占区以外的广大国统区。

抗战胜利后,关金券大量进入市场。通货膨胀必然引起货币贬值、物价上涨。法币的面额越来越大,5千、1万、10万元券继续发行。关金券的最大面额是25万元,即等于法币500万元。

于是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宣布“法币”崩溃,实行币制改革,发行金圆券。即所谓实行“金本位”。

金圆券1元等于法币300万元发行,面额为:1元、5元、10元、50元和100元五种。一张100元金圆券等于3亿面额的法币。这样,钞票最大面额由原来的5百万跃至3亿元了。

钞票在人民心中已无信用,民间藏有的银元开始在市场上流通,造成银元买卖行业。金圆券的面额愈发愈大,到1949年3月发行5千、1万元券;4月发行5万、10万元券;5月发行50万、100万元;已

印好的 500 万元券不及发行、就解放了。

旧中国的钞票贬值,受害者是广大人民,根据资料统计,货币增发指数以 1937 年 6 月为 1 的话,到 1949 年 5 月已达 1400 多万倍。有一个很形象比喻:1937 年法币 100 元可买大牛 2 头,到 1945 年只能买鱼一条,到 1947 年只能买五分之一根油条,到 1949 年 5 月只能买 1 粒米了。(注:据《上海金融史话》)

(三)硬辅币(银角子、镍币、铝币)

1. 银角子(俗称角子)是光绪十四年开铸银元时铸造的,分 2 角、1 角两种。原来规定是 10 进位,即 10 角兑 1 银元。后因角子含银成色不足,市场上用角子买东西要贴水,到民国初年,形成 12 个角子合 1 银元的比价,所以角子叫“小洋”,银元叫“大洋”。

2. 镍币是 1935 年法币政策后铸造的,当时银元、银角子已不通用,镍币分 2 角、1 角两种,10 角兑法币 1 元。

3. 铝币是 1941 年汪伪中储券发行的同时铸造的,也分 2 角、1 角。但数量极少,不久就被中储券辅币所代替。

(四)制钱(俗称铜钱)是我国秦朝以后通行的货币。清末民初海宁流通的是黄铜铸的“光绪通宝”,它是货币的最小单位,也与历朝一样、外圆 1.5 公分到 2 公分不等,中间是一方孔。它的单位叫“文”,民间习惯叫“钱”或“钅”。很早以前开始,制钱的携带方法是每一千个用麻绳穿入方孔中打结扎牢,所以一千钱也叫“一串”、“一吊”或“一贯”(如戏剧“十五贯”也就是十五千铜钱之意)。光绪末年开铸,市场通行以银元、角子、铜元计价,铜钱逐渐停铸而退出流通领域,到民国初年,虽仍在使用,但携带不便,价值又小而停止使用。

(五)铜元(俗称铜板)是光绪廿六年(1900)铸造“光绪元宝”开

始，它以紫铜浇制，中间无孔。每个铜板重二钱，一面是龙的图案，一面是“光绪元宝”和“当十文”字样。它的面值是十个制钱，也有少数较大的“当二十文”铜板，俗称“双铜板”。

开始时铜板与银元的比值是 100 枚铜板兑 1 银元。民国元年铸的“开国纪念币”铜板，一面是两面五色国旗图案，一面是“当十文”和“开国纪念”字样，它与清朝的铜板一起流通，比值相等。

当时人们在认识上还是以铜钱为主，所以一个铜板习惯叫“十钖”、十个铜板叫“一百钖”。后来铜板贬值，到 1927 年北伐战争后，一个银元可兑 280 多个铜板。而且每天比价不同，海宁境内各镇均以硖石米市的比价为准（硖石是根据上海市场的比价）。这种银元与铜板的比价，称为“洋价”（即“洋钖”的价格）。各地比较大的商号多逐日用水牌公布“洋价”，如“今日洋价二千八百五”，即 285 个铜板兑 1 银元。

1931 年，国民政府下令统一“洋价”，规定 300 个铜板兑 1 银元（即“洋价”三千）。

1935 年实行“法币政策”后，铜板与银元、角子同时退出历史。

（六）代用币。

1. 筹棒。清朝末年铜钱贬值，国家铸钱得不偿失，于是少铸或停铸。市场流通因铜钱少而很感不便。于是各镇比较大的商号自制筹棒以代替铜钱，一般面值是一文、二文和三文。谁家制发的，归谁家兑现，一般只限于本镇流通。

筹棒是用竹片制的，长约五、六公分，阔约 1 到 1.3 公分，厚约 4 公厘。它的一头钻有小孔，便于用麻绳串成整数。筹棒的两面用火铁烫有面值和发出的商号名，如：“××镇××商号；当制钱×文”等。

民国以后，铜钱贬值，铜板成了主要辅币，筹棒于 20 年代初期就

消失了。

2. 邮票。抗战初期的1937、38年间,由于辅币缺乏,市场买卖很不便,出现了以邮票当辅币的奇特现象。邮票代币首先是上海的电车上流行当另钱用的,后来各地多仿效了。

3. 代价券。由各地商号印制代价券当辅币使用是1938年下半年开始的。代价券的面积大小不等,由发出商号自定,大约相当于火柴盒那样。代价券由较大商号托印刷厂印好后,加盖本店图章生效。它的面值由一分到一角、二角,也有少数印到五角的。券的正面印上“××商号代价券”和“×角”字样,反面盖章。到1941年汪伪“中储券”发行后,代价券才由发出商号兑现而消失。

4. 谷票、米票。米票是抗战初期出现的,当时货币混乱,人们以米计价,于是主要是由米行印制发出的。它的面值由一升、二升、五升到一斗,由发出米行兑米或兑钞票。米票只限发行米行所在的镇上流通,因有抵算米价的纠纷,不久即消失了。

谷票是1947年下半年开始、由国民党海宁县合作社联社发行,主要是给公教人员发工资用的。因当时法币贬值,物价飞涨,公教人员已不能保证基本生活,于是以谷计薪,发给谷票代货币。谷票在海宁全县通用。随着解放即将胜利,谷票也消失了。

综上所述,从清末到解放的50年间,由于政治腐败,内忧外患,造成经济危机不断,通货恶性膨胀,物价上涨,国家贫困,民不聊生。从货币这一侧面看,多次币制改革,人民对国家发行的货币很不信任;相反,大量财富集中在几个少数财阀政客手里,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、军事侵略,导致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。

历史教训值得注意,国家的经济建设必需政治稳定,才能在和平环境中发展,才能使人民生活不断富裕,这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所证明了的。